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N 高端声音

善于用思想的力量治国理政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品格与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体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武器。

思想的力量强大而重要。有好的思想才有好的思路，有好的思路才会有发展的宽广大道。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思想治国理政的品格与智慧，不断增强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本领。

韩庆祥

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治国理政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其治国理政的品格与智慧。笔者认为，问题意识、直面难题、敢于担当、辩证思维、刚性执行、战略定力，是习总书记最为鲜明和突出的治国理政品格与智慧。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问题意识、敢于担当、刚性执行，这是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

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刚性执行

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问题意识”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四个全面”中的矛盾、问题和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重点在于补齐短板。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相关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主要是针对过去一定时期我们治党失之过宽、过松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而言的，是针对我们党面临“四种危险”这一问题而被强调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都是针对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提出的，“问题”中呈现思想，思想中蕴含着“问题”。

习近平直面问题在本质上是为了解决问题，进而实现其治国理政的目标。目标是在解决问题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在解决问题进程中也在逐渐实现着目标。所以，习近平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习近平那里，治国理政特别注重确定目标。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都紧紧围绕这一奋斗目标而展开。

目标确定之后，实践和实现是最为关键的。要实现奋斗目标，就首先要落实和完成一个个具体任务，而要顺利完成诸多具体任务，就必须具有刚性的执行力。历史和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具有刚性执行力，什么时候就能顺利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由此，习近平特别注重并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刚性的执行力。他强调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因而，要具有钉钉子的精神，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还要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

我国“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就进入了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时期，从学术上也称之“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时期。当今，民众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和公正诉求等日趋觉醒和增强。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后，需要精准且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然而，在当今我国，不仅在客观上，人均资源占有率还比较低，资源配置也不够公平，而且在主观上，一些民众的文明素质也不是很高，如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利益少讲担当，多讲自由少讲纪律，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多讲索取少讲奉献，多讲表达诉求少讲合理合法等。面对矛盾和问题，有些人缺乏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回避和掩盖矛盾，使矛盾“堆成山”，积重难返，成为“难啃的硬骨头”，严重阻碍

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攻坚克难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也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而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伟大梦想”而奋斗。在这“三个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难题，也要破解影响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问题”，还要破解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这意味着新一届党中央是在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

今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创新人才、创新技术以及金融立国等比较优势。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决策正确并能举全国之力办大事。1978年以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亦即核心利益、核心竞争力，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治国理政，应发挥好这一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习近平治国理政，特别注重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补齐发展短板。能举全国之力办大事，表明我国具有高度集中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是如何在推进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效破解这一时代性课题，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习近平那里，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具体来说，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首先是一个战略性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级大国的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需要有效解

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时，虽然我国取得一些成就，但整体效率还不是很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年以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开创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方向。市场经济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实行转型。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党政主导力量，使我国能集中资源和力量办成了许多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大事”，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力量，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放和发展了经济生产力。人民主体力量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群众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奉献（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和牺牲精神），而且也体现在他们是城市、农村及各行各业的具体建设者。

把控方向·战略定力·充满自信

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首要就是正确处理党、国家、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把控方向，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具体说，就是在根本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习近平那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是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

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之后，要坚定不移地坚守，这叫“战略定力”。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他注重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科学谋划。此外，他还致力于解决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命运性问题”，如党内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在这方面很具有战略定力。

习近平对确定的正确政治方向不仅具有战略定力，而且充满自信而敢于担当。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充满着自信。他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了，到2050年，这样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他对我们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也充满信心。正因如此，他注重使用“中国”二字，如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等概念。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哲学教研部主任）



权力，而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就容易导致权力至上。在当今中国，这种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易导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治国理政，应努力补齐这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补齐发展短板，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他强调要努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也是如此。尤其他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更是如此。

治国理政还要打牢发展支点。发挥“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这一比较优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政主导，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当今，还要注重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克服权力至上且权力高于能力的短板，要求我们既注重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又注重民主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就是把党政主导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且注重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由此，治国理政就必须打牢六大支点：党政主导；市场支撑；人民主体（自然包含民族凝聚）；自主创新；二基结合；民主监督。习近平治国理政，特别注重打牢这六大支柱。他既注重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如他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人民力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又注重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相结合、协调；也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方向，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推进“自主创新”；还强调民主监督，注重民众参与。

哲学思维·顶层设计·凝聚力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分析解决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有许多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有许多难题需要积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确立辩证思维。由此，在治国理政中，就需要运用战略辩证法。习近平在治国理政问题上，特别注重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谋划，如他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他又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战略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如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阐述，对“四个全面”之间关系的论述等。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切都是从头做起。这时，在很大程度上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各种因素和力量都要竞相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准研判实际，做出科学决策，确定正确理念、目标、思路和战略布局。习近平反映历史发展和实践发展新趋势新要求，运用哲学思维，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

顶层设计确定之后，凝聚力量实现目标是关键，在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的情景下，更是如此。由是，习近平十分注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价值观、中国梦的共同梦想、外交战略的合作共赢等，来凝聚力量，包括凝聚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从而为实现顶层设计提供了力量支撑。

党政主导·市场支撑·人民主体

结构转型，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1978年以前

供给侧改革有三大任务
真正落地要激发创造性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大任务：优化供给结构、创新驱动供给以及改革引领制度供给。

首先，要通过“减法”和“加法”实现结构调整，推进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减少高耗能、高污染的无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大力淘汰“僵尸企业”；要改造落后供给，盘活呆滞供给，提高供给品质，适应国内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减少消费外流；要创造新增供给，鼓励企业通过创新进入“蓝海”市场，为消费端制造“惊喜”；要补足短缺供给，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在垄断行业引入新的投资者。

其次，要以创新驱动供给质量和效益提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二是效率的提高。供给侧改革是要从原来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再次，要以改革引领，强化制度供给。制度创新是“解放生产力”最关键的创新，它会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使市场总各主体的活力竞相迸发。改革是优化制度供给的唯一途径，要靠改革来引领制度供给，激发人的积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落地，主要靠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与推进改革主体这三大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振企业家精神，激活科研人员创新精神和官员的担当敬业精神。

中国企业“走出去”
要学会使用国际语言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规避风险，不但要转变观念，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要学会国际语言。

国际市场把投资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项目，一类是私人部门项目。公共项目涉及公众利益，有一套公共项目的审查机制，私人部门项目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按照市场机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来审查项目。国有企业的名义对外投资，尤其到发达国家时就会存在问题，因为发达国家认为国有企业代表的是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安全审查和一般的市场化私人项目是不一样的，要求是更严格的。我们的国有企业都是市场化改革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了，完全都是商业化的项目，但是国外不听这种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到境外投资如何讲好国际语言，对于我们的国有企业，要补上这一课。

教育决策机制需完善
利益相关人参与决策机制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认为，教育决策机制要完善利益相关人或其代表参与决策机制。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是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是公共政策出台的应有程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就要建立和完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相关方面有序参与决策的机制，以共治求善治。

政策就是价值和利益表达。从民主决策来看，一要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充分征求和合理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建议。二要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使政策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如问一项政策对与错，可能见仁见智，如问一项政策是否得到多数人支持，则比较容易操作。但这里仍有三点需要关注：一是取样是否科学，有时会面临“沉默的大多数”。二是有时不能采用简单多数，这就在强调民主决策的同时，坚持制度理性和专业选择，关键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有时大多数是相对的。例如进城务工人员流入地、就地考试，就会存在不同范围的多数，这时就需要分析和统筹。